

东林沉浮



程万军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前 言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笔者登上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是2014年的事，而播出《东林沉浮》则是两年后，迄今为止《东林沉浮》已经播出两次，分别是2016年、2017年新旧不同的两个版本，而这里奉献给大家的，是第三个版本，内容充实了三倍，可谓全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东林全传”了。

我们知道，在当下车载斗量的说史热潮中，明史是一大热门，但在诸多明史分野中，东林史记只占一小部分，现代明史学者在涉及东林党时，大多泛泛而论，关于东林的系统史书，只有一本清代学者陈鼎所著的《东林列传》可参照，但此作忠奸概念先入为主，过于脸谱化，亦难道足史实真谛。笔者以为这是个憾事，其空白值得填补。

为什么东林党的历史值得细说呢？笔者之所以关注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史学热议的党争，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一类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清流。

关于清流的是非，历史上存有两种结论，一是“正义论”，二是“误国论”，近年来，后者声浪压过前者。

而笔者由东林沉浮，更多联想到的是士大夫的节操问题，素以节士著称的清流们，说好的节操却在国家存亡与个人生死的紧要关头出了问题。其中最触动笔者心灵深处的一段史记，是明王

朝灭亡时，出现的这样一首绝命诗：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留命一条！

这是公元1645年，南明都城南京城破前夕，一首乞丐所写的绝命诗。在国家灭亡之际，目睹残明百官焚香跪迎清军入城，他感叹，为什么没有人殉国？他不解，这个政权养了那么多士大夫，到头来为什么他们全作鸟兽散，纷纷向外敌投降，其气节竟不如像他们这样的乞丐？难道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只能留在田间地头？这些国家精英为什么如此不争、如此无耻？

乞丐留下了一连串疑问和愤懑，写了此诗之后，他从百川桥一跃而下，投秦淮河自尽。

他的疑问和愤懑，可谓千年一叹。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进步，关键在于主流人群的不腐与进取，这种人群现代称之为“精英”，古代称之为“士”。回顾中国古代史，确有一股股以读书人为主的士人中坚群体，他们有节操有理想，也敢于担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命运。但是到了两宋以后，中国士大夫却渐渐不堪，不仅无力救国，甚至成为政治蠹虫、无耻之尤。这是为什么？

很多史学爱好者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土地、金钱换和平的耻辱记录，而且这个王朝还层出以气节著称的清流节士。但是，明王朝最终却还是亡于满族之手，和北宋败于女真部落军队之手一样。而且，输得比北宋还惨——北宋是失去长江以北半壁河山，大明朝则是失去了整个江山。北宋亡国时留下的是一时之痛：靖康耻；明朝亡国时留下



的则是永久之痛：剃发易服。泱泱大国，亡于东北少数民族部落之手，在几个清兵的剃刀下，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排队，更换具有被征服象征的外族指定发型，反抗者寥寥，这又是为什么？

史料记载，公元1644年，清摄政王多尔袞借明内乱趁火打劫，率八旗入关时，只有区区六万军队，最后却征服了拥有百万大军的大明王朝。可见，明廷没落到了何种地步！而没落之首，当属堂上之士。早在清军入关前，投降清朝的明朝大员就有十儿人，中下级官吏降清的更是不可胜数。到了1645年，清军渡过长江后南明都城南京城破，文武百官几乎悉数降清，之后，南逃的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再遭群臣变节，本人被手下重臣劫持献于清兵。

这些士大夫，在朝为官时，正气凛然，满口忠义，但是明亡时，“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农民起义的大顺军和游牧民族的清军，谁来降谁。明朝士大夫的无耻之举，连他们的新主子也看不过眼。多尔袞曾当面讥笑这些人是“明朝罪人”。

而后来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编了一本《贰臣传》，对那些卖主求荣的士大夫大加羞辱，这本《贰臣传》，一次就收录了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自我标榜为“十全老人”的乾隆，高举道德大棒，指责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

所谓“大节有亏”，就是气节与操守出了大问题。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天朝上国，冷兵器时代败给了总人口只有50多万的女真人分支——建州女真，一方面，建州女真创建的满洲八旗兵强马壮是事实；另一方面，明朝士大夫迂腐，贪腐也是事实。两个事实对对碰，此消彼长。前者一到，后者就像老鼠见了猫，再



多也是被食的货。

南明灭亡前夕，此时残明已经是士气残缺，没有血性的国家。而反观日本、越南（古称安南）、朝鲜等明朝藩属国、准藩属国，此时仍奉南明为宗主，派使者入贡。其中朝鲜还厉兵秣马，翘首盼望明师北伐，而且，清朝立国后的很多年，朝鲜仍着明服。

属国如此，主国却不堪。

后来朝鲜等来的，却是身着满人衣冠的汉族士人，他们非常失望，形容此时中国士大夫，说他们“文明程度高，但无气”。

诚哉斯言。气节一失，再无上国！

世界史学界在评价一个国家行不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那就是看这个国家在国难时期有多少精英人物投敌。明亡前，给敌出主意的是明士大夫，引狼入室的也是明士大夫，帮敌冲锋的还是明士大夫，在清军入主中原后期，可以说都是大明降将在帮着清军扫平全国。

为什么他们在外敌面前一触即溃，却又在帮外敌打自己人时那么卖力？为什么明亡前很少出现伟岸的士大夫？

我们说一个王朝将要灭亡，常用这样一个词：气数已尽。什么是气数？首先就体现于“士气”，即士大夫的信仰、气节与操守。历史反复证明，士气盛，则国家旺；士气衰，则国家败。

大家只知道，明朝对外没有割地赔款，却不知这个王朝的精神本质。从政治到文化，在很多领域明朝的统治者都开了先河，但很多是开了坏头。如果一个王朝统治者用恐怖棒杀打折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那么，风雨来时，这个王朝当然就会失去被断了“脊梁骨”的他们的支撑。

写下悲壮诗歌的南明乞丐，只知朝廷养了士大夫三百年，文



人士大夫表面活得很有样儿，但他却不知，在明朝皇帝脚下，那些士大夫实质上是否活得比乞丐更有尊严呢？那是一种怎样的养，是包养、圈养、驯养，还是三者兼而有之呢？

纵观明史，最惨烈的士大夫时代莫过于万历、天启、崇祯三代，因为其间出现了有明一朝规模最大的清流集团——东林党，以及虐杀他们的“天敌”——史上最大的阉党集团。那么，就让我们以之为样本，看看他们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体味一下离我们并不太远的那三百多年前中国节士的境遇，从“铁肩担道义”，到“节操碎一地”，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而，或许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失魂丧气“窥一斑而知全豹”，进而以史为鉴，痛定思痛，甚至于现代士魂——中华精英精神之重建，也大有裨益吧。

目 录

- 第一讲 江河日下争国本 / 003
- 第二讲 清流罢朝，八老建“党” / 011
- 第三讲 朝野互动：三才卡位，东林总动员 / 025
- 第四讲 三战上位之挺击 / 035
- 第五讲 三战上位之红丸案 / 049
- 第六讲 三战上位之移宫 / 063
- 第七讲 天启初，诸党退位，东林独盛施新政 / 075
- 第八讲 天降魏阉，势不两立 / 091
- 第九讲 暗战：阉党扩张，东林动口不动手 / 105
- 第十讲 决战：“杨左”上疏，敢笑天下无男儿 / 131
- 第十一讲 客奶妈请神，“巨婴”帝站队 / 141
- 第十二讲 辽案逆袭：抓捕六君子 / 153
- 第十三讲 杨涟遗言：万莫再读书 / 165
- 第十四讲 东林浩劫：高攀龙之死 / 177
- 第十五讲 民变？江南人打死了锦衣卫 / 185
- 第十六讲 兵变？同党遭难，孙督师反是不反 / 193





第十七讲 天启末，魏公公治理中国七百年 / 205

第十八讲 崇祯倒魏，平反东林 / 217

第十九讲 浪子的心情：一个东林党魁的异变 / 233

第二十讲 无用大儒：贪腐迂腐都是腐 / 243

第二十一讲 大兵压境，东林唱罢阉登场 / 251

第二十二讲 与国崩盘：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 263

第二十三讲 东林挽歌：最后的血性 / 271

第二十四讲 忆党人，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 281

第二十五讲 清流为何难救国？甲午一战给答案 / 293

第二十六讲 东林之后：流亡者彻悟 / 303

后记 邻镜高悬：堂无节士国必朽 / 313

附录 东林党与魏（阉）党总名录 / 329

公元 17 世纪初叶，年过二百的大明帝国江河日下。

此时的中国学堂，屋内书声琅琅，屋外雨打纱窗。

国家形势走向下坡路，学子们除了读书，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大事？

堂上教书的先生们，给出了两个答案。

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自道学先生的语录《增广贤文》。

另一个则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诞生于一座布满传奇的儒学书院。

这就是威震晚明朝野的东林书院。

公元 1604 年，在雄踞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东方大国正以惊人速度政治沙化之际，江南无锡却蓬勃而出一块一万多平方米的士人绿洲。那里聚集着一群特殊的读书人，自称清流。他们济济一堂，讲读儒经，品评政客，关心国家大事，决心以天下为己任，拯救道德沦丧的大明国。

带着理想和信念，他们登科入仕，参与发动了五场朝堂战争。

那么，五战结果如何？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后果怎样？

他们是匡扶正义的末代救世主，还是空谈误国的爱国贼？

是舍生取义的真君子，还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伪君子？

是王朝将死的回光返照，还是国家气若游丝的最后生息？

一切还是让我们从头看起。



第一讲

江河日下争国本





公元 1593 年，大明王朝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呢？

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那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危机。大明臣子知道这届皇帝是谁，但不知道下届皇帝是谁，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明王朝有皇帝没有太子。

那么此时大明王朝的皇帝是谁？他就是声名狼藉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年他执政已经超过了 20 年，早已到了该立太子的时候了，但是他却在这年过完年之后，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正月拟旨决定暂不立太子，而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预示着一场皇帝接班人争夺战，正式打响了。

熟悉明朝历史的读者，对这个万历皇帝可能都略知一二。因为他创造了两项大明皇帝的历史纪录，第一个纪录：在位时间最长。万历皇帝在位 48 年，这个在位时间打破了明朝皇帝在位时间的纪录，大明十六帝，统治中国 276 年，而他一个人就占去六分之一的光阴。他虽然不是明帝中自然寿命最长的（明朝皇帝活得最久的是太祖朱元璋，71 岁；万历皇帝朱翊钧 10 岁即位，58 岁去世），却是坐皇位最久的福寿皇帝。第二个纪录：不“上班”时间最长。万历皇帝 30 年不上朝。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呢？当然跟他的政治能力有关。我们知道，万历皇帝刚即位时才 10 岁，是首辅张居正代为执政 10 年，张居正死后，20 岁的万历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没干几年就干不动了，为什么？因为没张居正那个执政水平。他本以为抓取权力，自然就会治国理政。但是一上来处理军国大事才明白，掌权与任事，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就有些撂挑子。这是他长期不“上班”的一个原因，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跟下面将要打响的这场皇帝接班人争夺战有一定的关系了。

当时皇帝的接班人有几个候选人呢？主要有三个。



就是万历皇帝准备一并封王的那三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五子朱常浩。他们分别由万历皇帝的三个妃子所生。朱常洛是王恭妃所生，朱常洵是郑贵妃所生，朱常浩是周端妃所生。这三个人当中五子朱常浩因为年龄小，当时才两岁，胜出的可能性很小，是个陪衬。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身上。

提及皇帝接班人，中国封建王朝有个一以贯之的皇帝接班制度：嫡长制。这个嫡长制简单解释就八个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帝正室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为皇位第一合法继承人，如果皇后没有生子，就要自然排序由其他嫔妃为皇帝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皇长子接班。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的正室王喜姐（孝端显皇后）只生了个女儿，没有生儿子，那么按照嫡长制自然排序，朱常洛无疑应该排在第一顺位，他是万历皇帝的大儿子，但是万历皇帝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呢？因为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一位宫女“偷情”的结果，这个宫女姓王，她就是朱常洛的生母，后来的王恭妃，当时叫王宫女。万历皇帝虽然与王宫女偷了情，王宫女为万历皇帝生了孩子，也被万历皇帝封了妃，但万历皇帝却不喜欢她。为什么不喜欢她？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嫌她出身卑微。这个王恭妃当时就是太后的一个内侍宫女，相当于一个使唤丫头。二是万历皇帝嫌她年龄偏大，长相不好看。想必当年万历皇帝与她“偷情”，也是一时冲动，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

因为不喜欢王恭妃，所以他对王恭妃所生的这个儿子朱常洛，也始终喜欢不起来。那么万历皇帝喜欢哪个妃子，哪个儿子呢？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



这个郑贵妃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人，她在万历皇帝面前，特别善于撒娇耍脾气，非常任性，这种做派和一般女人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的女仆相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万历皇帝感到很新鲜很刺激，这个“野蛮女友”不一般。于是与郑贵妃陷入了一场昏天暗地的热恋中。这个郑贵妃也没白受皇帝的宠，为万历皇帝生下一子——三子朱常洵。这个朱常洵，一落地就是个大胖小子，虎头虎脑，很招人喜欢，万历皇帝很喜欢他。老三长得富态，有帝王相，所以他有意把皇位传给老三，废长立幼。这样就回到笔者开头所讲的，接班人危机的爆发点了。

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夏历正月，万历皇帝以手书诏示内阁，拟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大儿子不是唯一候选人，三个孩子都有机会，以后择优录取，三选一，再确定皇帝接班人。其实我们知道，他这样做主要是想把接班人的位置留给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这下子就点燃了朝堂的“火药桶”了，这皇家内室还没怎么着，宫外的大臣先炸了锅了。尤其是那些言官反响强烈。我们知道，大明王朝官员大多是苦读儒家指定教材四书五经上来的，认死理，而且大明言官制度特别发达。大明言官级别不高，但人数众多、作用突出。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给了言官充分的话语权。自由度比较大，他们的职责就是言事，风闻之事都可以说，道听途说的都可以对皇帝讲，一般他们的话不太出格，皇帝是不治罪的，即便治罪也会很快平反，平反之后反倒捞取了政治资本。所以在这种风气下，明朝的大臣们特别爱较真，在奉行封建纲常的核心制度嫡长制上，他们不折不扣。因为明朝奉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发展学科宋朝理学，而理学向来强调继承人的正统性，所以，就传承了“太子者，国之根本”



之说，于是，有明一朝，朝臣便把立太子视为争国本，为此就是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场国本争夺战，大臣主要分成两派。一是保皇派，二是立长派。保皇派大臣和万历皇帝站在一起，认为皇帝立不立太子，立谁为太子，那是皇帝的家事，应该由皇帝个人做主就行了，大臣们就别掺和了。而立长派大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立太子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废长立幼有违封建礼法，万万使不得。万历皇帝对跟自己唱反调的这些立长派大臣非常反感，严厉打击，将他们的首脑赶出内阁、驱离朝堂，但是立长派大臣不为所动。尤其有一个大臣，顶风而上，直接向保皇派的内阁发起挑战。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东林人，东林党的创始人、大名鼎鼎的顾宪成。

那么顾宪成为什么敢冒着被严惩的风险，向保皇内阁乃至皇帝发起挑战呢？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顾宪成这个人物——

顾宪成，号泾阳，无锡人。无锡明时为县，归常州府管辖。家居江南的顾宪成是晚明一个著名的清流人物。

什么是清流？顾名思义，就是清正之流。在明朝这是个褒义词。对于清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给出了正面解释——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也就是说，清流是一群读书君子，他们重气节、轻名利，有原则、讲正气，爱憎分明，是非清晰，品德高尚。

在明朝，清流是一支重要的士人力量，从在野的名师到在朝的言官，清流可谓无处不在。以清流闻名于世的，前者有大破瓦剌再造大明的北京保卫战主帅于谦，后者就是以顾宪成为首的这批晚明党人。



顾宪成以个性操守闻名于世。这个人从来不趋炎附势，从来不溜须拍马。据《明史·顾宪成列传》记载，顾宪成入朝为官时，首辅大臣张居正执政，权倾朝野，所以群臣都巴结张居正，而顾宪成偏偏与张居正拉开距离，不去巴结他。有一次张居正病了，群臣都去探望，而顾宪成不去。有的大臣看见顾宪成没有去，担心日后会遭到张居正的报复，所以在探视名单上，好心替顾宪成签上了他的名字，顾宪成得知以后，特意赶过去把名单抢过来，用力划掉自己的名字——我没来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争国本前后，顾宪成担任的是一个要职——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吏部就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文选司是专门负责任命文职干部的人事厅。那么顾宪成这个职务，就相当于组织部里的文职干部人事厅厅长，这个职务级别不是很高，正五品，但是权力巨大，专门管提拔文职官员的，几分钟谈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提拔了很多他认为是君子的道德模范官员。这些官员大都成了顾宪成的拥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顾粉”。

皇帝要废长立幼，顾宪成坚决反对，并把矛头对准了保皇派首领、时任内阁首辅大臣王锡爵。说王锡爵一味迁就皇帝，不敢主持公正。那王锡爵也不是软柿子，他是堂堂名门望族出身，本人还是嘉靖壬戌科的榜眼（科举廷试第二名，仅次于状元），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在朝堂是一品大员级别的元老重臣，对顾宪成这个五品中层官员当然不甘示弱，于是二人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王锡爵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意思是说，现在真是奇怪了，这政府要做的事，有人推动社会舆论唱反调。顾宪成反唇相讥：“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

耳。”确实是很奇怪啊，为什么社会舆论百姓希望政府做的事，政府必要反过来做呢？

万历皇帝对王锡爵这种识时务、处事灵活的大臣比较欣赏，不断擢升重用。而对顾宪成这种较真认死理的大臣，非常反感。万历二十二年，国本之争让顾宪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开除公职，赶回老家。

顾宪成是在争国本白热化之际被解职回家的，他去职之后，好多争国本的立长派大臣前赴后继，踏着顾宪成的足迹，勇往直前，继续死谏皇帝，万不可废长立幼，乱了纲常秩序。

国本之争到了相持阶段，万历皇帝的意志开始崩溃了，这帮大臣真是太难缠了，打死也要争，于是改变策略，对争国本的群臣由打改为拖。皇帝罢工不上朝了。

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开争，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的亲妈李太后出场了，她和万历皇帝做了一次围炉夜话，为这场国本之争一锤定音。

《明史》记载：“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

这段史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太后见大明王朝迟迟不立太子，于是就把万历皇帝叫来问为什么，你对接班人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不想立常洛为太子呢？万历皇帝默认了。老太后问为什么呢？万历皇帝就说，他是“都人”生的孩子。什么是“都人”呢，就是下人，这里指宫女。他是宫女所生，出身卑微。李太后听后勃然大怒说：小子，别忘了，你也是宫女所生的孩子！万历皇帝一听这话，想起了老妈的身世，老妈李太后，本名李彩凤，原本是北京通州区漕县镇一位泥瓦匠家的苦孩子，